

复旦大学历史系 编

第二辑

复
旦
中
学
专
刊

1950年代的中国

吴景平 徐思彦 主编

復旦大學 出版社

复旦史学专刊 第二辑

复旦大学历史系 编

1950年代的中国

吴景平 徐思彦 主编

复旦大学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50年代的中国 / 吴景平, 徐思彦主编.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8

(复旦史学专刊)

ISBN 7-309-05093-2

I. 1… II. ①吴…②徐… III. 社会发展史—中国—现代—文集 IV. K27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1997 号

1950年代的中国

吴景平 徐思彦 主编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18853(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史立丽

总编辑 高若海

出品人 贺圣遂

印 刷 句容市排印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5 插页 1
字 数 376 千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309 - 05093- 2/ K · 187
定 价 2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在中国断代史的研究中,清史、民国史研究的重要性,已经为国内外史学界所公认。相应的专业教学与研究人员、机构与学术团体、刊物和各种出版品等,都被视作中国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史学界普遍认为,目前对于清史、民国史研究有很大的投入,而对于1949年之后的中国史即当代中国史的研究,其处境要困难得多。如档案史料的开放与研究课题选择的限制,申请研究经费的困难,出版发表论著往往要通过特定的审查。甚至在史学界(包括文史档案工作部门)还有不少人,实际上不承认对当代中国史进行相对独立的专门研究的必要性,看不到当代中国史的研究已经具备学术和现实意义上的可行性。

但是,当代中国史作为相对独立的史学分支学科的重要性,又是不容置疑的。应当看到,新中国成立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当代中国的各主要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主要领域,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对外交往领域,都发生了重大变迁,与1949年以前的中国大不相同。与此相应的,当代中国史研究已经形成了其自身的基本资料文献。各级档案部门已经整理和开放了1949年之后的大量藏档,已经有多种当代中国史的多卷本专题资料文献问世,如《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以及各专门领域的档案文献选编。近二十年来,各地、各行业、各部门编撰的志书,其下限一般都延伸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各主要图书馆,1949年之后的各种报刊杂志保存完好,查阅方便。再从对外学术交流来看,整个20世纪下半叶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变迁诸领域的重大问题,在国外都有人

从事过专门研究。国外不少著名大学都设有关于当代中国的专门研究机构,进行着不少的研究项目,出版了有分量的著作,如《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而《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更是西方学者二十多年前的研究成果。相比之下,由于缺乏研究基础,中国大陆学者在不少问题上很难与国外学者进行对话。再从学理上看,当代中国史有很强的现实性、政治性、政策性,对不同学科专业方法的借鉴有更大的需要。这就更需要其有独立的学科地位,从而促成其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学术界,尤其是史学界同仁,应当更多地关注当代中国史的研究,更多地投入于当代中国史的研究。

应当看到,多年来在当代中国史的学科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如国内高校已经单独设有当代中国史学科点,培养博士生、硕士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和当代中国史研究会编辑出版有专门的刊物《当代中国史研究》;大型丛书《当代中国》已经有很大的影响;《当代中国编年》1949年卷已经问世;当代中国史研究年会每年举办,当代中国研究国际论坛隔年举办。

复旦史学专刊之所以要收入这本专题论集《1950年代的中国》,就是要进一步加强对当代中国史的研究,推动相应的学术交流。事实上,复旦大学历史系较早开设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专业课程,修课学生来自人文和社会科学,甚至理科与医科等专业。目前复旦大学历史系以及经济、政治、法律、管理、社会等专业的相当部分学者近年来的研究工作已经转向当代中国史研究领域。不少学者都发表有关于当代中国史的论著,其中有的成果还获得省部级奖。如历史系每年都有数名硕士生、博士生选择当代中国史领域的学位论文题目,其中已有多篇博士学位论文通过答辩。历史系资料室、复旦大学图书馆、上海市图书馆都有相当数量的当代中国史专业期刊和藏书。上海市档案

馆对于1949年以后的档案已有较大程度的开放。在历史系的研究生培养方案中,已经设立了基础课“当代中国史专题研究”、“当代中国史史科学”、“当代中国史方法”;学位专业课则包括了当代中国的行政区划、政治制度沿革、经济、金融、社会、科教、文化等领域的研究,上海、台湾、香港等地区研究,以及当代中国的方志与地方文献、档案文献等。这些构成了新近复旦大学在历史学一级学科之下单独设立“当代中国史”专业博士点的基础。另外,上海在整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也呼唤学术界对当代中国和上海的历史有独立全面的专业研究,培养高层次的专业人才。换言之,在教学和研究生培养方面,当代中国史已成为非常重要的专业方向。

但是,在深入推进当代中国史的个案研究方面,在努力推进高层次的学术交流方面,我们感到有必要从最基本的工作做起。其中,就重点研究的时段而言,“历史的起点就是逻辑的起点”,我们认为首先要从自1949年起的一些基本问题做起。因此,当2003年复旦大学历史系与《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商讨共同发起和举办关于当代中国史的学术会议的主题时,双方一致同意了“1950年代的中国”这个题目。这就是2004年8月14—15日由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联合主办主题为“1950年代的中国”的学术讨论会的主要缘由。这也是在国内首次召开的有关1950年代中国历史的专题研究会,来自北京、上海、南京、中国台湾以及美国的高校、研究机构的30余位学者参加了会议,提交论文涉及外交、经济、金融、文化、教育、社会以及人物研究等领域,可以说是对多年来研究成果的较为集中的展示,也对如何推进1950年代中国历史的研究作了探讨。而目前收入这本专题文集的16篇论文,均在那次会议上进行过宣读、评议、讨论,尔后各位作者又进行了补充润改。我们希望,这些文稿的结集出版,能够引起诸多学者同仁对当代中国史研究有关问题的关注和投入,能够促进当

4 1950年代的中国

代中国史研究条件的进一步改善。

编者

2006年6月

目 录

前言 / 1

过渡时期理论与实践取代新民主主义历史背景的

——一项考索 姜义华 / 1

上海私营金融业与“三反”“五反”运动 张徐乐 / 55

1950—1970 年代中国的三次对外经济

——引进高潮 陈东林 / 83

票据交换所与解放初期的上海私营金融业 吴景平 / 107

上海私营工商业与人民胜利折实公债 高晓林 / 125

从老股票看 1950 年代的股份制企业 朱荫贵 / 148

解放前保险业未清偿寿险契约在 1950 年代的解决

——以私营华安合群保寿公司为中心 赵兰亮 / 169

转型与延续：文化消费与上海基层社会对

——西方的反应(1950—1960 年代早期) 张济顺 / 207

建国初期上海高校的院系调整研究 王立诚、管蕾 / 233

“大跃进”与 1950 年代中国城市女性职业发展

——以上海宝兴里为中心的研究 陈 雁 / 260

解放初期的禁娼斗争述略 邵 雍 / 277

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停战谈判决策研究 牛 军 / 295

1950 年代中国处理边界问题的原则和办法

..... 廖心文 / 322

1956年10月危机：中国的角色和影响

——“波匈事件与中国”研究 沈志华 / 333

顾维钧与美台关于沿海岛屿的交涉(1954年

12月—1955年2月) 金光耀 / 395

改造渊源论：1950年国民党改造运动的内在

历史脉络 王良卿 / 413

“1950年代的中国”学术讨论会综述 张徐乐 / 456

过渡时期理论与实践取代新民主主义历史背景的一项考索

姜义华

建国以后不久,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骤然放弃了先前有效地实践了的新民主主义,转而全盘接受了苏联过渡时期理论。这一转变,成为近些年来国内外史家关注的一个热点。杨奎松《毛泽东为什么放弃新民主主义——关于俄国模式的影响问题》、胡绳《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论》、逢先知等《毛泽东与过渡时期总路线》、于光远《“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等文,从不同角度推进了这一问题的研究。

不少论者仍坚持过渡时期理论是新民主主义的应有之义与必然发展,是毛泽东针对建国后出现的新形势、新问题,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作出的独特的、极具创造性的贡献,尽管其实施过程有过快过急的缺陷,仍应充分给予肯定。

然而审视一下毛泽东过渡时期理论的核心观念,便不难发现,它们与新民主主义的核心观念常常截然对立,与后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观念倒惊人的一致。为了更为深刻地认识过渡时期理论的实质,有必要对毛泽东过渡时期理论核心观念形成的历程及其同新民主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关系,作非常认真的全面梳理。本文试图通过毛泽东过渡时期理论几个核心观念形成过程中若干关键性事件的辨析,对此提出一些浅见。

过渡时期理论核心观点的 形成及列宁晚年的反思

十月革命后,列宁和俄共(布)打算“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①。1921年10月29日,列宁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就此反省时说:

你们回想一下我们党从1917年底到1918年初所作的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声明,可以看出我们那时就认为革命的发展、斗争的发展,可能是通过比较短的道路,也可能是通过漫长的而艰苦的道路。但是,在估计可能的发展时,我们多半(甚至我不记得有何例外)都是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这种推断出发的,可能这种推断并不总是公开表达的,但始终是默然意会的。^②

过渡时期理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适应这一需要而创立的。

集中阐述过渡时期理论的,是列宁1919年10月30日所撰写的《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以及在此前后所撰写的一批文章。文章首先指出:

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隔着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义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征。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

^① 列宁:《十月革命四周年》,《列宁全集》第33卷,第39页。列宁在这篇文章中坦率地承认:“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

^② 《列宁全集》第33卷,第64~65页。

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脆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①

此前,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中,列宁已说过:

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在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他们在遭到第一次严重失败以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战斗,为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为他们的家庭而斗争……^②

正是基于这一估计,过渡时期的本质,就被确定为无情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彻底消灭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还指出,过渡时期还有另一项根本性任务,这就是同农民小商品生产进行不调和的斗争。这是因为“农民经济仍然是小商品生产,这是一个非常广阔和极其深厚的资本主义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资本主义得以保留和复活起来,而且同共产主义进行极其残酷的斗争”^③。稍后,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这段论述被概括为一段更为有名的结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④

为了完成过渡时期的历史任务,必须坚定不移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阶级始终是存在的。阶级一消失,专政也就不需要了。没

① 《列宁全集》第4卷,第84页。

② 《列宁全集》第3卷,第640页。

③ 《列宁全集》第4卷,第86页。

④ 同上书,第181页。

有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是不会消失的。”^①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列宁更指出:

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不进行长期的、拼命的、殊死的战争,不进行需要坚持不懈、纪律严明、坚韧不拔和意志统一的战争,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②

而之所以称作专政,列宁解释说:“专政就是铁一般的政权,是有革命勇气的和果敢的政权,是无论对剥削者或流氓都实行无情镇压的政权”^③,“人类只有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达到社会主义。专政,这是一个残酷的、严峻的、血腥的、痛苦的字眼,这样的字眼是不能随便乱讲的。社会主义者提出了这样的口号,是因为他们知道,除非进行殊死的无情的斗争,剥削阶级是不会投降的,它将用各种好听的字眼来掩盖自己的统治”^④。而这一专政,需要“使成百成千人的意志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因为“个人独裁成为革命阶级专政的表现者、代表者和执行者”^⑤。

现代“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不了解也不承认过渡时期上述特点。《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指出: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根本就厌恶阶级斗争,幻想逃避这种斗争,力图缓和、调和和钝化这种斗争。所以这类民主派根本不承认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或者认为自己的任务是设法把相互斗争的两种力

① 《列宁全集》第4卷,第91页。

② 同上书,第181页。

③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第517页。

④ 列宁:《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同上书,第835页。

⑤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同上书,第521、520页。

量调和起来,而不是领导其中一种力量进行斗争。^①

以上这些论点,是正在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的理论概括,也是全力推行军事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然而,实践很快证明,这一理论以及与此相应的各项政策,使新生的苏俄迅速为极其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所笼罩。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如列宁 1921 年 10 月所说:“由于我们企图过渡到共产主义,到 1921 年春天我们就在经济战线上遭受了严重的失败,这次失败比高尔察克、邓尼金或皮尔苏茨基使我们遭受的任何失败都要严重得多、危险得多。”^②几百万人在饥荒中死亡,死亡人口最多的地区,就是各项军事共产主义政策贯彻得最彻底的地区。农民暴动在俄国各地成了“普遍现象”,列宁痛心地说:

到了 1921 年,当我们度过了而且是胜利地度过了国内战争最重要的阶段以后,我们就遭到了苏维埃俄国内部巨大的、我认为最大的政治危机,这个危机不仅引起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的不满,而且引起工人的不满。当时广大的农民群众在情绪上不是自觉地,而是本能地反对我们的,这在苏俄的历史上是第一次,我希望也是最后一次。^③

四年的实践,已充分证明,由以上核心观念构成的过渡时期理论与实践与军事共产主义实践,并非颠扑不破的客观真理。试图在小生产广泛存在的基础上,依靠国家政治权力的强制作用和无情的斗争,直接进入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社会变革实践中必然造成巨大的破坏性的后果。列宁和俄

① 《列宁全集》第 4 卷,第 85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33 卷,第 44 页。

③ 同上书,第 380 页。

共(布)不得不开始退却。但是,面对随后的实践,列宁终于开始对军事共产主义进而对整个过渡时期理论进行全面的深刻的反思。在一个小农占优势的落后国家,究竟应当如何走向社会主义?列宁说:“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是根本改变了。”^①这里所强调的是“整个看法”和“根本改变”,它集中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先前强调整个过渡时期是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和衰亡着的资本主义进行你死我活不可调和斗争的时期,这个时期阶级斗争必然空前尖锐化。这时,列宁的见解改变了。他指出:

没有争取国家政权的斗争,社会主义就不能实现。但是……国家政权既已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剥削者的政权既已推翻,全部生产资料(除工人国家暂时有条件地自愿租给剥削者的一部分生产资料外)既已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现在情况就大变了。……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组织“文化”工作上面去了。

这个文化工作,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纯粹文化方面,因为俄国文盲很多;二是物质方面,因为要成为文明国家就必须有相当发达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必须有相当的物质基础。“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了”^②。

其二,先前一再强调农民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③，“小私有者和极端利己主义的自发势力是无产

① 列宁:《论合作制》,《列宁选集》,第4卷,第687页。

② 同上书,第686~688页。

③ 列宁:《论“左派”幼稚病和小资产阶级性》,《列宁选集》第3卷,第540页。

阶级的死敌”^①。这时,列宁转而要求俄国农民“应该牢牢记住”要具有“做商人的本领”,要了解“他现在是按亚洲方式做买卖,但是为了善于做商人,就得按欧洲方式做买卖”。他并写道:“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善于把我们已经充分表现出来而且获得了完满结果的革命胆略和革命热忱与(这里我几乎敢于说)做一个干练而又具有知识的商人的本领(有了这种本领就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合作社工作者)结合起来。”^②在经过彻底摧毁中世纪制度和大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并在这个基础上培植出广大的小农和最小农的情况下,保持住工人政权在小农和最小农中间的威信和对他们的领导,主要不是依靠在农村中持续不断地开展阶级斗争,而是“发展我们的大机器工业,发展电器化”,使俄国“从农民的、庄稼汉的穷苦的马上”跨到“大机器工业、电气化、沃尔霍夫水电站等等的马上”,使社会主义“将不是在小农国家的水平上,在这种各方面都很有有限的水平上坚持下去,而是在不断地前进、向着大机器工业前进的水平上坚持下去”^③。

其三,先前一再强调“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④,是对资产阶级及其他社会主义敌人最无情最奋勇的殊死斗争。这时,列宁思考得最多的却是如何“改造我们原封不动地从旧时代接受下来的简直毫无用处的国家机关”^⑤。他发现:“我们的国家机关,除了外交人民委员部,在很大程度上是很少经过比较认真改变的旧机关的残余。这些机关仅仅在外表上稍微粉饰了一下,而从

① 《列宁全集》第27卷,第260页。

② 《论合作社》,《列宁选集》第4卷,第684页。

③ 《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同上书,第711页。

④ 《无产阶级革命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3卷,第623页。

⑤ 《论合作社》,《列宁选集》第4卷,第687页。

其他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①而对于如何改造,列宁所最关注的,就是如何使这些国家机关通过俄国工农中的优秀分子而同真正的广大群众联系起来,以及使国家机关的组织和工作有计划、有目的、有系统。

其四,先前痛斥“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设法把相互斗争的两种力量“调和起来”,这时,正是列宁本人,一再强调必须“在城市工人与农村劳动者之间建立相互的联系,确定一种可以很容易建立起来的友好互助形式”,力主“应当从建立城乡的联系开始,决不能过早地给自己提出向农村推选共产主义的目标”,指明“这个目标现在达不到的,是不合时宜的,现在提出来不但无益,反而有害”^②。

这些事实表明,军事共产主义实践中形成的“过渡时期理论”,这时确实“整个看法”发生了“根本改变”。先前反复强调的各核心观念,这时如果不说已基本上被否定,那至少也应被认为大大冲淡。“过渡时期理论”与列宁晚年的思考,实际上代表了走向社会主义两条不同道路的探索。列宁去世后,斯大林主导的苏联社会主义实践,重新突出了“过渡时期理论”,列宁最后的探索被许多人所忽视遗忘了。

然而,尽管斯大林在苏联实行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镇压社会上和党内对此持异议者的过程中,反复重申并具体实践了列宁原先的过渡时期理论,这一理论对于正在领导民族民主革命的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本人,都未产生很大影响。毛泽东本人所着力构建的新民主主义,不能说和上述列宁—斯大林过渡时期理论无关,但是,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两者主张常常是完全不同。

首次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概念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15日发表)便提出:

① 《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列宁选集》第4卷,第693页。

② 《日记摘录》,同上书,第679页。